

近代以来华侨华人与中医药在新马的传播发展

冯立军

(厦门大学 东南亚研究中心、南洋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关键词]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华侨华人; 中医药

[摘要] 本文主要分析了中医师南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原因, 论述了他们在新马的医药活动, 并以此来说明他们在弘扬和发展中医药以及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为人类的健康服务方面所作的贡献。

[中图分类号] D634. 3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5162 (2004) 04- 0039- 08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Diffus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since 1840

FENG Li jun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Key words: Singapore; Malaysia; overseas Chines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cause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doctors' migration to Singapore and Malaysia and their medical activities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since 1840. It clearly shows that the medical activities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 the service of human being and the benefit of world health.

中医药是中华文化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古代便随着华人的迁移传播到马来半岛。在那里它不仅是华侨华人赖以防病治病的主要手段, 而且也逐渐为马来半岛其他民族所喜爱和信赖。于是出现了以中医为生及从事中药材贸易的药材商。应指出的是, 当时从业者的数量并不多。但自近代以来, 随着华侨华人南迁东南亚国家人数的增多, 到达马来半岛的中医师及从事中药材贸易的华侨商人也大为增加, 使得中医药在马来半岛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本文试图通过对新马华侨华人从事中医药活动的阐述, 说明新马华侨华人在以中医药作为其谋生职业的同时, 还以高度的责任感将祖国的传统医学作为他们一生乃至几代人奋斗的事业, 努力将其发扬光大, 造福于人类。

一 中医药南来新马的历史背景

中国是中医药的发源地, 海外的中医药是由华人南迁后流传下来的民族传统医学, 因此新马两国中医药与中国本土的中医药是一脉相承的, 那么近代中医师是在怎样的环境下南来新马, 将

[收稿日期] 2004-07-11

[作者简介] 冯立军 (1970-), 男, 河北宽城人,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中外关系史。

中医药传播开来的呢？

(一) 社会因素：自 1840—1949 年的 100 多年里，中国深受内忧外患之苦，先后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在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政府之后，接着军阀混战，两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来又有八年抗日战争以及三年解放战争。期间中国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能够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另谋出路，成为他们心中的美好愿望。当时东南亚地区尤其是新加坡，被先去的华侨华人称之为“安乐土”。^[1]为了自身的安全与生活，他们远渡重洋来到新马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定居、行医。

(二) 经济因素：中国科举制的废除，阻塞了一般知识分子的进仕之途，因此有很多人去学医（因医师在当时是一种高尚职业），但在中国想成为一个正式的医师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来磨炼。首先学药理学，然后进行实习，如此经过至少五年时间，才可成为一个正式的医师，挂牌行医，但是生活并非因此而得到良好改善。一方面，在中国中医师很普遍，有些地方一个村便有几个医师，甚至民间很多人自己会开药方，因为生活困苦连三餐都成问题，有病自己寻草药医治，事非得已，绝不请大夫；另一方面诊费很少，为一个病人诊治只有二、三毛钱。如果是名医的话，一天可医十几个人，但须走十几里的路程，一天也只有几元钱。^[2]以此微薄的收入很难维持整个家庭的开支。与此相比，到新加坡的中医师一般生活都不错，依据医术的高低，其收入可在 100 元至 700 元不等。^[3]因此，为解决经济困难，一些中医师离乡背井来到新马等地。

(三) 新马医药人士的缺乏：根据有关记载，自 1786 年槟榔屿被强占起至 1957 年马来亚联合邦独立止，在英国约 170 年的殖民统治中，先后约有八九百万的华工被贩运输入英属马来亚和婆罗洲。^[4]这些人充当了开发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先锋和主力。他们为锡矿的开采以及胡椒、甘蜜、甘蔗、木薯、咖啡、烟草和橡胶等各种种植园的开发付出了极其艰辛的劳动，承担了巨大的牺牲。如在早期锡矿地带，“时常受着毒蛇、野兽、蚊虱、害虫的袭击。当地恶性疟疾、霍乱、痢疾流行，得病而死者很多。苦工们多数患有风湿、脚气、腹肿和黄疸病；由于工作过于劳苦，受热或不服水土，常常昏厥或窒息。矿场里没有医生，也缺乏药品，不论病情轻重，只胡乱搽些药油，服点土药，不少人丧失了生命。”^[5]以一山场为例，它最初招募猪仔 50 名进行开发，半年之内，仅存 2 名，其他 48 名“则死于疾病水土不宜者有之，死于蛇螫者有之，死于虎噬者有之”。后来场主再招猪仔 50 名，又经半年，垦荒始毕，种上胡椒，生存者仅 14 名。^[6]又如 1873 年由中国移民到拿律的苦力，每年约有 2000—3000 人，在砍伐森林时即有 10—20% 死于热病，当矿山开始开采时，已有一半的人死去了。^[7]而 1890 年一位华民助理护卫司在检查槟榔屿的一个甘蔗种植园后也承认，“差不多所有的苦力都有病，不是这种病就是那种病，唯一的医院就是雇主私人住宅的马厩院中的一个小棚屋。”^[8]据说 20 世纪初，每 1000 名“苦力”中每年死亡者达 200 人以上。^[9]

虽然上述华工的病、死与过度的劳累和雇主的虐待有很大的关系，但是缺医少药，得不到及时的救治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显然，随着华侨华人数量的激增以及华工的病死，新马等地对中医药的渴望已成为一种需要。^[10]

在新加坡亦存在同样困惑。鲁白野在《狮城散记》中不无感慨地说，“在 1840 年，华侨富商为数不多”，虽然“对社会上的福利，慈善等公益事业，都能热心办理”，但“这时从中国到了大批劳工，传染病很流行，而市内医药设备非常简陋缺乏”^[11]，因此，很多时候是无能为力的。

(四) 华族本身的因素：自近代以来，华人不断南迁，使得新马地区华侨华人的总数大为增加，尤其在新加坡，华族占绝大多数。中医药是华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是华族人士，特别是下层群众所信赖的能够保障其健康的业务。加之当时的官方卫生机构还不普遍，中医药业于是成为各族人士的主要卫生保健事业之一。也就是说，中医药业的产生，与新马华人社会的存在是不可分割的。

(五) 其它因素: 除上述几种情况外, 中医师还因以下一些因素来到新马。诸如逃兵役而来、因参加抗日工作为躲避追捕而来、寻亲而来、因医术高超受邀请为人治病而来等等。

二 新马华侨华人所从事的中医药行业

新马华侨华人所从事的中医药行业主要有开办药材店、行医、种植中草药做药农等。

(一) 药材店

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中药店, 从出入口商到零售商一般皆由华侨华人经营^[12], 其中以药业起家闻名于世者, 主要有周兰阶和胡文虎。周兰阶是新加坡著名的药材店周兰记的创办人。周兰阶 1872 年出生于广东大埔县的大留乡, 15 岁时开始作水客, 常到新加坡。1890 年, 他用作水客积攒的钱, 在松柏街开设万裕祥客栈。三年后, 周兰阶又开设周兰记药材店, 该店共有 4 幢三层楼的店屋, 规模非常大。据说, 当时新加坡有 80- 90% 的药材店都是向周兰记拿货。^[13] 而且, 当胡文虎从仰光到新加坡来发展时, 曾经发生药材店不卖胡文虎永安堂药品的事情, 经过周兰阶的劝说之后, 虎标药品才得以畅销。足见周兰阶在新加坡医药业的影响力。

胡文虎祖籍福建永定, 是土生的华侨。其父胡子钦早年由中国徙居缅甸仰光, 是一位悬壶济世的中医。在行医的同时, 胡子钦还经营一间名为“永安堂”的中药店。1907 年胡子钦去世后, 遗留下的永安堂由胡文虎和其弟胡文豹共同继承。但是由于二人都不谙岐黄之术, 所以他们只能合伙共同经营药材店的生意。为求发展, 胡文虎先后到中国、日本等国考察, 感到只有改进中药, 才能在与西药的竞争中占据上风。遂和其弟研究中缅药物, 聘请多名西药师, 试制成多种后来风行全球的虎标良药: 万金油、八卦丹、轻快水、头疼粉, 其中尤以万金油最为抢手。^[14] 1913 年, 胡文虎由仰光迁居新加坡, 并创立“虎标永安堂”^[15], 设为总行, 后又先后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等地广设分行。1932 年, 他又把总行从新加坡迁到香港, 在广州、汕头建制药厂。从此, 虎标万金油等成药成为中国和东南亚各地老少皆宜的家常药品, 胡氏兄弟也成为号称“万金油大王”的百万富翁。^[16]

(二) 行医

吴瑞甫在新加坡是很著名的中医师, 他祖籍福建同安, 其家自明代以来, “世代皆以医名”。吴瑞甫十四岁开始研读古代医籍, 经过十几年的学习与实践, 至三十多岁, 已成为一位远近闻名的医生。有记载说, “凡经诊断, 病无遁形; 一投汤液, 二竖潜踪”, 于是, 有人称之为“今世华扁”。^[17] 然而吴瑞甫医师从不敢自满, 他以为医关人命, 稍一不慎, 贻误良多, 因此对于历代名医著作, 无不搜购研读。甚至, 在西医大规模传入后, 他也加以研究, 并著有《中西温热串解》和《中西脉学讲义》^[18] 两书, 将中西医学的优劣, 进行详细而公正的批判。1937 年, 日本侵华, 攻陷厦门, 先后以维持会长、海军秘书、市长之职诱逼吴瑞甫为日本人服务, 但他都加以拒绝。在被逼十余次, “倘再不就, 决意拿办”的情况下, 乘安徽轮船潜逃来到新加坡, 寓居在同安会馆, 仍以医为业。由于医术高超, 求其看病者络绎不绝。吕振和的母亲患肿瘤, 经多位专家会诊, 在三月内必死。其家因受西方文化教育, 并不相信中医, 后有邻居推荐吴瑞甫医师, 调治二月, 竟然痊愈。十年后, 吕母病复发, 其时吴瑞甫医师去世已经六年了。无奈进医院调治, 虽然花费万余金, 但最终仍不治而亡。临危时吕母还不无遗憾地说: “使吴先生在, 吾疾当不致若是之剧也”。^[19] 吴瑞甫医师被人如此推崇, 可见其医术之精湛及在新加坡影响力之大。其余中医师本文不再一一详细叙述, 只将部分列表展示于下。

(三) 药农及中草药的交流

随着华人的南来, 中草药以及中国丰富的草药知识也远播南洋各地, 并发掘和结合当地植物的特性为传统的中草药注入了新的血液, 使得各地的生草药更具地方色彩, 在疾病的治疗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新马中医师简况列表

姓名	祖籍	所在国	主要业绩
曾志远	福建南安	新加坡	中医师公会创办人之一
游杏南	福建上杭	新加坡	中华施诊所创办人之一
黄南寿	福建	新加坡	中华施诊所创办人之一
陈树岐	广东潮安	新加坡	中华施诊所创办人之一
李春亭	琼州	新加坡	
陈庆元	福建龙岩	新加坡	筹建中华医院
应锡祺	福建峡阳	新加坡	创仁爱医院，筹建中华医院
吴秉璋	福建金门	新加坡	创光亚医局
许崇轩	广东潮安	新加坡	中医师公会发起人之一
陈祖云	广东大埔	新加坡	创保安堂药行，筹建大巴窑中华医院
许颖之	广东澄海	新加坡	中医师公会发起人之一
陈复昌		新加坡	筹建大巴窑中华医院
游鸿南	福建上杭	新加坡	
何君畅	琼州	新加坡	筹建大巴窑中华医院
唐逢祥	福建	新加坡	
符志逢	海南文昌	新加坡	
梁润之	广东顺德	槟城	
陈树楠	福建闽侯	新加坡	设立陈树楠基金
林清渊		槟城	
谢敦禄	闽南	马来西亚	

资料来源：宋哲美：《星马人物志》；新加坡中医师公会：《大巴窑中华医院落成纪念特刊（增订本）》和《新加坡华侨志》等。

在新加坡，本地生草药种类不多，市面上所出售的本地生草药种类常见的有：怪柳、茅根、蔘菜、朱蕉、紫万年青、狗肝菜、积雪草、天胡荽、水线草、红丝线草、白花蛇舌草、在牛车水一带还可见有生侧柏叶。^[20] 华人南来后，由于对中草药的熟悉，有人竟专门从事生草药的种植，成为名副其实的药农。陈朝卿便是其中之一。他 1915 年左右从中国来到新加坡，最早以养猪为生。26 岁时曾协助一位亲戚种植草药，从那时起他开始接触和认识草药，为以后自己种植草药打下了基础。后来由于有一次猪瘟流行，使猪农们损失惨重。陈朝卿便改以种草药为正业。起初向友人拿一些药种来种，而后品种逐渐增加，最后他所种的草药已近 200 多种。当时因为医药不十分发达，成药还不普遍，所以生草药的需求量很大，他每周需要两次将草药分送至大坡、小坡以及后港等地的生草药店。据说每日的收入足以维持全家大小的生计。^[21]

马来西亚与中国中药材的交流已有悠久历史。有人统计，在马来西亚的中草药达 456 种，其中包括关沙苑（冬葵子）、川加皮、牛七、菖蒲、明冉（党参）、凤眼草、益智子、白豆蔻、白芷、金牛、周胆星、九里明、苏木、柴胡等。^[22] 《马来亚医药书》（The Medical Book of Malayan Medicine）开列了马来药方（配方）543 项，其中引用了不少中草药，例如中国茄根（terong China）、中国纸（kertas China，在其上涂以蛋青、椰油、生姜丝等，敷于患处，用以治胃痛）、良姜（lengkuas China）、甘草（akar mans China）、米酒（烧酒，arak nasi China）、大茴（八角，adas China）、川槿皮、菝葜（gadong China）、川芎、灵香草（百草香）、菖蒲（香甘草）、桂皮、佛手、白芥子、白菜饼等。^[23] 当然，在马来西亚的中药店也出售马来草药，有水线草、丹草、白花蛇舌草、马齿苋（gelang，penawar）、旱莲草（orang- aring）、伤寒草（jenduang hair）、羊蹄草、天泡子（letup- letup）、野甘草（popok kelambu）、蛇百子（lerkuing）、毛蓼（panchis）、入地蜈蚣（jelai）等。此外，在马来西亚民间还有把中草药和马来西亚草药混合服用的习惯。^[24]

在新马，客家人是从事医药业的最大方言群，如上面所提周兰阶和胡文虎即为他们代表。客家人的药材店除了周兰记和永安堂之外，松柏药行、公益庄、万山堂等这些历史悠久的药材店也都为客家人开办。据前任客属总会会长卓济民说，现在新加坡的药材店大约有 80% 是客家人经营的，其中广东大埔人开设的药材店大约有 300 家，福建永定人的药店有 50 至 60 家。在中医师当中也以客家人居多。客家人经营的颇具规模的药材进出口公司有中华、兴华、泰兴、万泉、裕庆、公益庄、万山堂、嘉升等，制造家庭良药的公司则有永健、松柏、何保安、友联、三枪、大东、春生堂、保利等。^[25]

台湾学者李亦园曾对马来西亚柔佛州麻坡市的各方言群华侨华人所从事的职业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在当地华侨华人所从事的职业（包括大胶园主、小胶园主、商人、零售商、工人、技工、胶工、书记店员、教员、小贩、医药、专门职业、渔畜、宗教、家务以及无职业者）中，888 名漳泉人有 9 人从事医药行业，占总数的 1.01%；1432 个永春人中从事医药者有 3 人，占总数的 0.20%；766 个潮州人中有 2 人从事医药业，占总数的 0.26%；518 名海南人中只有 1 人从事医药行业，仅仅占总人数的 0.19%；686 个广府人中有 8 人从事医药业，占总数的 1.17%；183 位兴化人中只有 1 人从事医药业，所占比例只有 0.55%；343 个雷州人中有 4 人从事医药业，占总数的 1.17%；只有客家人所占比例较高，346 位客家人中有 21 位从事医药行业，占客家人总数的 6.07%。^[26] 此调查尽管不是面对整个马来西亚，但是它基本上反映了客家人对马来西亚中医药业垄断的事实。

三 保护和发展中医药

中医药是中华文化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人类的一块瑰宝，但在近代，无论是在中国本土还是在新马地区，它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和限制，为此，新马华侨华人采取多种方式来保护和发展中医药。

（一）成立中医药团体

1. 新加坡中医中药联合会

近代以来，随着西医西药的传入，中医学曾被斥为“唯心主义”、“民族的耻辱”，甚至被等同于骗人的“巫术”。更有甚者，1929 年在民国政府卫生部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打着“医学革命”旗帜的余云岫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的提案，企图借政治压力，消灭中医药，让西医药取而代之。消息一经公布，全国中医药界群情激愤，强烈抗议。这就是中国医药史上有名的“三·一七”斗争。

“废止中医令”的提案虽然最后不得被迫取消，但是轻视、歧视、排斥、打击中医的政策却一直在执行。为了保护中医药，中国各省市纷纷成立中医中药联合会作为团结中医药界同仁，维护中医药权益，并进行宣扬、研究与革新中医药学术的机构。

1929 年中国发生消灭中医药的“三·一七”事件，它不但关系中国本土中医药的存在，而且与海外中医药的发展也息息相关。新加坡中医中药联合会即是在此形势下由新加坡医药界老前辈梁少山、王爱华、曾有源、曾和生等的组织筹备下成立的。它是新加坡最早的中医药团体组织。该会成立后，不仅在联络各中医及药商方面发挥作用，而且附设有义务赠医部，并创办出版了“医药月刊”、“医航”等刊物，来介绍医药学术及心得，阐扬中医学术真谛。

二战爆发后，随着日军的侵入，该会业务宣告停顿，直到 1947 年才得以恢复。但总的来说，新加坡中医中药联合会在促使中医界同仁团结一致，互相切磋，加强中医药在保健工作上的力量及扩大中医药的影响方面都产生了重要作用。

2. 其它中医药团体组织

在新加坡，除了中医中药联合会之外，还有新加坡中药进出口商公会、中医师公会、齿科公

会、中药公会以及中医药提炼药业促进会等等。在马来西亚，二战后中医药团体也纷纷成立，在马来西亚华人医药总会属下的会员团体有 24 个，诸如中马中医师公会、吉隆坡药业进出口商公会、雪兰莪华人药业公会、麻坡中医中药公会、森美兰中医中药联合会等等，遍布槟城、吡叻、彭亨、雪兰莪、森美兰、马六甲、柔佛、砂劳越和沙巴各州。^[27] 这些中医药团体的成立不仅在联络同业、集思广益、团结互助、维护公共利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在争取和维护中医药的合法地位以及弘扬中医药学方面也发挥着力所能及的作用。如新加坡中药进出口商公会即是为申请 A. P. 及外汇证明书，争取入口货物的便利而成立的。^[28] 它和中药公会的成立，确保了中药来源的稳定及充足。马华医药总会在成立之后，对内力求提高中医药素质，像创办马华医药学院以培育人才等；对外则极力向政府争取各项权益，像争取草药入口免税，请求承认中医师合法地位等等。

（二）培养中医药后辈人才

在 1950 年之前，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中医大部分来自中国或香港；也有的是由本地老中医传授知识给徒弟或子女；还有的则是靠自修及积累经验而挂牌行医。^[29]

然而，1950 年英国殖民地政府颁布移民限制条例，致使中国中医师不能再进入新马。新马中医药界面临着旧有的中医师将会逐渐老迈而后继无人，未来将严重缺乏中医药人才的困境。

于是自 1953 年起，先后有新加坡中医师公会创办中医专门学校，1955 年中马中医师公会主持的马华医药学院（1992 年 5 月改为马来西亚中医学院），之后又有 1961 年成立的砂劳越诗巫中医夜校（1961–1963），可惜因师资缺乏，只办了一届。在砂劳越的古晋，砂劳越州政府在 1965 年 4 月正式批准砂劳越中医学院成立，但由于种种原因，到 1980 年便停办。槟城的槟榔屿中医中药联合会在 1962 年 10 月 1 日成立了槟榔屿中医学院，至今共培育了 9 届毕业生。另一间槟城中医研究学院在 1989 年由槟城中医师公会所创办。在南部的柔佛州，该州的四个中医药团体在 1965 年 8 月 8 日成立了柔佛州中医学院，但因学生来源少以及师资不足，只办了两届便停办。

虽然如此，由于这些院校皆以发扬中医学术、培养中医人才为办学宗旨，因此自创办以来，已培养出许多中医药的人才。据 1990 年代初的统计，新加坡约有正式中医师 600 多人，其中约有 80% 是从正规中医学校毕业。^[30] 马来西亚到 1976 年，全国已有中医师 1000 余人，较年轻的中医师大多数是由国内中医学院自己培养的毕业生。^[31] 他们现分布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各地，有的自己开设诊所，有的受聘担任医校教职，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各民族健康服务，成为新马中医师的中坚力量。中医界得此大批新鲜血液，使中医药学在新马得以延续发展。

（三）中医药的研究与交流

几千年的中医药发展史是各个历史时期中医药先进经验的积累，是继承与发展的完美体现。新马中医药界深知只有不断研究、创新和交流，才能弘扬中医医学。

1. 中医临床研究

20 世纪 50 年代，新加坡开展了中医辨证治疗疑难病证的专题研究。其中如 1957 年，陈建基提出治疗癌症的“郁结说”，文中应用中医理论分析恶性肿瘤的成因为气、血、痰三者郁结积聚而成，因此临证应以调理气血、化痰通瘀而取效。1980 年代，杨松年在治疗艾滋病方面，也谈到由于该病起因于“正不胜邪”，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乘虚而入，治疗时当调理脾胃气血，重建免疫功能。此外，同济医院与国立医学院合作，开展中医中药治疗高血压的临床研究；中华医院应用电子脉搏诊疗仪开设特色门诊，诊断与治疗多种疾病，均取得一些经验体会。^[32]

2. 中药研究

新加坡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进行现代药学研究。1958 年以来该国举办了多期“中国医药展览”，涉及临床应用与基础研究。1972 年起，新加坡中医学院毕业班均有本埠药物研究的论文，登载于“毕业特刊”上，该学院草药组还开展了草药的实验研究，提取有效成分，并进行毒理试

验, 还热心发掘民间草药验方。1980年代起, 该国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合作开发新药, 主要是从中草药中提取抗肿瘤药物, 也有一些进展。^[33]

3. 中医药学术交流

中医药经过新中国几十年的创新和研究, 取得瞩目成就, 这对于新马中医药界有着很大的鼓舞作用, 因而通过各种形式进行双方甚至多方的交流与合作, 发展新马地区的中医药。主要包括中医药团体间的参观、考察、讲学和中医药学术研讨会等方式。

(1) 参观、考察、讲学

1987年9月, 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的戚丽宣等应新加坡疼痛协会之邀赴新讲学, 为该国西医师举办了“西医针灸学习班”。1987年12月, 应北京中医药学术研究促进会的邀请, 新加坡中医师公会代表团赴京访问, 考察了中国中医研究院。梁世海会长发表演讲, 题为“从新加坡中医师公会的历史, 看新加坡中医事业的现状”; 中华针灸研究院副院长陈水兴做了题为“激光戒烟的研究”的学术讲座。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秘书长王雪苔出席了报告会, 并会见了新加坡朋友, 他对新加坡中医界同道在发展本国中医事业和促进东盟国家学术交流方面所做的贡献, 给予高度评价。此后, 几乎每年双方都派遣人员进行考察与合作, 取得了良好效果。

(2) 中医药学术会议

20世纪70年代以来, 中国以及东南亚国家曾多次召开中医药学术研讨会, 如1977年6月的“马来西亚传统医药研讨会”, 1972年11月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的“世界针灸大会”等。1983年6月, 在新加坡由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泰国与菲律宾东盟五国的中医团体联合举办的“第一届亚细安中医药学术大会”, 会上东盟五国商定, 每3年举办一次同名学术大会, 以加强地区间中医界的合作。1987年7月, 上海举办“国际中医药学术大会”, 这是新加坡与中国上海联合举办的国际学术交流会。1990年5月, 在新加坡举行了“首届国际全息生物学学术讨论会”, 来自新、马、港、台、中、日、英、美、德、苏等37个国家和地区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大会。大会交流论文113篇, 对全息胚学说发表评论或介绍临床应用的体会。1995年7月下旬, 应新加坡卫生部的邀请, 中国中医研究院院长傅世垣、西苑医院院长李祥国、广安门医院院长姚乃礼等访问了新加坡, 并同意协助新加坡卫生部在新加坡宏茂桥社区医院内建立首家针灸研究诊疗所。这标志着新加坡国家卫生部与中国中医药行业建立起了正式的联系。

现代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与中国以及世界各地的中医药团体之间的交流是非常广泛的, 其活动和项目之多, 难以一一赘述。这反映出新马两国中医界在弘扬和发展中医药上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同时也表明中医药在中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以及其他世界各国中医药团体和个人的努力下, 其影响力越来越大, 受关注程度越来越高, 接受和信赖的人群越来越多。当然亦说明, 古老的中医药正在走向世界, 为全人类的健康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注释]

- [1] 除1941-1945年太平洋战争期间以外, 东南亚与中国相比还是相对安全的。
- [2] 1971年南大历史系《新加坡的中医》报告资料摘录, 载新加坡中医师公会主办:《大巴窑中华医院落成纪念特刊(增订本)》, 新加坡:新加坡中医师公会出版, 1980年, 第318页。
- [3] 1971年南大历史系《新加坡的中医》报告资料摘录, 载新加坡中医师公会主办:《大巴窑中华医院落成纪念特刊(增订本)》, 新加坡:新加坡中医师公会出版, 1980年, 第319页。
- [4] 林远辉、张应龙:《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1年, 第133页。
- [5] 李文:《我所知道的南洋华侨黄陆佑》, 载《广州文史资料》, 第23辑, 1981年, 第208-209页。
- [6] 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 上海东方印书馆, 1992年, 第181页。
- [7] 陈翰笙、卢文迪:《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北京:中华书局, 1984年, 第5辑, 第190页。
- [8] 布莱司:《马来亚华侨劳工简史》, 载《南洋问题资料译丛》, 1957年第2期。

- [9] 熊孝梅:《马来亚殖民经济中的华人》,载《广西师院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2期。
- [10] 华侨华人更喜欢用中医药治疗疾病,不喜欢西医。
- [11] 鲁白野:《狮城散记》,吉隆坡: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第6页。
- [12] 唐史青:《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经济》,台北:海外出版社,1956年,第134页。
- [13] 区如柏:《祖先的行业》,新加坡:胜友书局,1991年,第51页。
- [14] 林水椽:《创业与护根——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儒商篇),台北:“中央研究院”东南亚区域研究计划,2001年,第152页。
- [15] 康吉父:《胡文虎传》,香港:龙门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45页。
- [16] 陈民:《胡文虎》,载《民国人物传》卷5,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99页。
- [17] 新加坡中医师公会:《大巴窑中华医院落成纪念特刊(增订本)》,新加坡:新加坡中医师公会出版(增订版),1980年,第202页。
- [18] 新加坡中医药促进会主办:《中医学研究院第三届毕业纪念刊》,出版者不详,1978年,第97页。
- [19] 新加坡中医药促进会主办:《中医学研究院第三届毕业纪念刊》,出版者不详,1978年,第97页。
- [20] 新加坡中医师公会:《大巴窑中华医院落成纪念特刊(增订本)》,新加坡:新加坡中医师公会出版(增订版),1980年,第260页。
- [21] 新加坡中医师公会:《大巴窑中华医院落成纪念特刊(增订本)》,新加坡:新加坡中医师公会出版(增订版),1980年,第260页。
- [22] David Hooper: On Chinese Medicine : Drugs of Chinese Pharmacies In Malaya , in The Garden' s Bulletin , Strait Settlements, Vol VI, December 1929 , Part 1, No. 1- 5 (戴维·胡柏:《关于中国医药:马来亚中药店的药材》,载《海峡殖民地植物园公报》)。
- [23] David Hooper: On Chinese Medicine : Drugs of Chinese Pharmacies In Malaya , in The Garden' s Bulletin , Strait Settlements, Vol VI, Oct. 1930 , Part 3, No. 11- 15 (戴维·胡柏:《关于中国医药:马来亚中药店的药材》,载《海峡殖民地植物园公报》)。
- [24] I. H. Burkill and Mohamed Haniff: Malay Village Medicine, in The Garden' s Bulletin , Strait Settlements, Vol. VI, April. 1930 , Part 2, No. 6- 10 (布尔基尔与穆罕默德·哈尼弗:《马来农村医书》,载《海峡殖民地植物园公报》)。
- [25] 区如柏:《祖先的行业》,新加坡:胜友书局1991年版,第52页。
- [26] 李亦园:《一个移殖的市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台北:正中书局印行,1985年,第246-252页。
- [27] 唐志尧:《新加坡华侨志》,台北:侨务书刊编印发行中心印行,1959年,第184、185、188页;杨建成:《英属马来亚华侨》,台北: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1986年,第62-65页;新加坡中医师公会:《大巴窑中华医院落成纪念特刊(增订本)》,新加坡:新加坡中医师公会出版,1980年,第241、272、291页;吴华:《新加坡华族会馆志》第3册,新加坡:南洋学会出版,1977年,第34-36、55-58页。
- [28] 新加坡中医师公会:《大巴窑中华医院落成纪念特刊(增订本)》,新加坡:新加坡中医师公会出版(增订版),1980年,第329页。
- [29] <http://oec.xmu.edu.cn/magazine/showtem.aspx?contentid=276>. 2004. 06. 19.
- [30] 李经纬:《中外医学交流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61页。
- [31] 李经纬:《中外医学交流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65页。
- [32] <http://www.39.net/professional/traditional/200109/10473020010928.htm>. 2004. 6. 15.
- [33] <http://www.39.net/professional/traditional/200109/10473020010928.htm>. 2004. 6. 15.